

浅谈《格桑梅朵》中边巴人物形象

郑春玉

(武警警官学院基础部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既是西藏文学在1980-1990兴起的特殊时期的代表作品，也是以被解放者的视角看待解放史实的革命文学。本文主要探讨了小说中主人公边巴的人物形象。

关键词：人物形象；边巴

《格桑梅朵》再了解放军解放西藏的重大历史事件，边巴作为《格桑梅朵》的主人公，具有执拗、不屈的性格特征，他勇于反抗，最终自我觉醒，是一个从个体不自由到自由的人物形象缩影。

1 在迫害中不屈

在西藏旧的封建制度下，主人公边巴不仅家族世代皆为农奴，而且自己生下来也注定将要成为农奴，遭受压迫与欺凌。由于边巴的阿妈阿爸是犯了罪的农奴的孩子，于是边巴双亲的头上便刻有“狗”字，继而边巴在三岁时，也被领主在脑门上烙下了“狗”的字样。庄园主才旺桑珠说：“犯了罪的农奴和狗一样下贱，要终身在庄园里干活，不许到别处去。”烙印标志着边巴的奴隶身份，使边巴不论在哪里，都会因其奴隶身份而遭受不公平待遇。如边巴在要饭时，“有钱人看见‘我’额头上的‘狗’字，就说我是犯了罪的农奴，不但不给我吃的，还打骂我，讥笑我。”在这种封建制度下，边巴一家的奴隶身份是不可能有所改变的，虽然边巴的父母选择了逃亡，却最终仍被领主抓住，幼小的边巴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在火中被活生生的烧死，而其母亲则下落不明。

边巴所遭遇的，不但没有使边巴向命运屈服，而是激起了他顽强地反抗命运。在流放期间，他开始思考“难道老爷们真是‘高贵’的人，有福气的人，我们奴隶就是‘下贱’的人，没有福气的人吗？我们今生受苦，来世还要受苦吗？我们的苦究竟有没有头？！”，随后边巴便否定了自己逆来顺受的念头，他下定决心：“我就是死了，到十八层地狱去，也要把噶朵和益西这些恶鬼一起带走”。他没被悲惨的遭遇打倒，反而更加顽强地站起来与恶势力斗争。阶级压迫与父母遇害的仇恨，是边巴漫长痛苦的来源，即便边巴在加入解放军后，也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与恶势力斗争。如边巴学枪时便想：“现在我要把枪法练得好好的。以后遇到噶朵，一枪就把他打死。”

2. 在流放中反抗

流放不仅是边巴被庄园主与活佛串通后的流放，更是边巴的心灵被自己流放。在流放中他并没有认命，而是开始了反抗，他的反抗是与解放军进入西藏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

小说中，在解放军即将进入西藏前，许多西藏封建社会的拥趸——庄园主、活佛、西藏地方政府的部分人员及藏军部分首领开始想方设法对人民群众灌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邪恶形象的认知，鼓动人民群众产生对解放军的抵触情绪与抵抗行为。在小说中的帮锦庄园里，庄园主与活佛传播“红汉人会吃人”、“人民解放军是恶鬼”的谣言。为了加深群众对于解放军的恐惧，他们还念咒诅咒解放军。

在这一过程之中，统治阶级为恐吓大众，拿边巴作为农奴的典型代表开刀，将其作为“恶鬼”而流放。在被流放到森林的过程中，边巴在肉体上“又冷、又累、又饿”，精神上“他感到无限的孤独和凄凉，觉得自己被整个世界抛弃了，得不到一点儿温暖、友爱和同情”。这一阶段是边巴接触解放军的开端，从时间上看，也是解放军进入西藏的开端。

如果说边巴在悲惨的农奴生涯中最主要的依靠是对于藏传佛教的信仰以及对解放军到来的期盼，那么他次要的精神寄托便是对于娜真——一个聪慧、善良、美丽的姑娘的宝贵爱意。这种心绪唯有在与娜真近距离接触、交流之中才能得到体现。而被流放的边巴

失去了与娜真接触的机会，因此他的精神依靠变得薄弱。被流放生活的困苦超越了他此前的生活环境，而娜真也从他的生活中消失，可以说他的生存环境不论从物理环境、还是精神环境上都变得更加艰难，因而他想到了死。即便是在这样的时刻，但他同时想到的是要战胜这种困苦，他首先想到的是：“我不怕死，但我不能死，我还没有报仇”，显然，与恶势力斗争成为支撑他活着的唯一稻草。通过来往于川藏的商贾佣人尼玛次仁大伯，边巴知晓了解放军的事迹与其光辉形象。于是“庄园主天然便应当统治农奴”的观念在边巴心中被解放了。于是边巴开始反抗，决定报复庄园主益西。此时，他对宗教的信仰虽然没有发生改变，但对统治阶级的认识却发生了变化。小说中写道：“雪山上的青松过一年多一道纹，农奴的孩子长一岁积一层仇”，农奴阶级对统治阶级的积怨已久，边巴对统治阶级的反抗行为实则是这种经年累月的怨恨下必然的产物。

3. 寻觅中脱下宗教的镣铐

边巴一直以来都在寻觅着信念——自己应该相信什么。显然，边巴最初相信的是宗教，如“额头的皱纹擦不掉，命中注定的事逃不脱”，但在与解放军的接触过程中，边巴最终脱离了宗教对自己意志的束缚，走向了以相信解放军为中心的心路历程。在这一过程中，他原先的佛教信仰转化为对解放军的坚信不疑，因此可以说是自我意志的觉醒。边巴的觉醒过程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解放军对他的关爱有加，待他亲善和睦，使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最终使他向解放军小分队队长说道：“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心甘情愿。”可以说是解放军用自己无私的爱赢得了边巴的心，使边巴对人民解放军产生了集体归属感。

边巴在解放军军队中已经寻觅到自己的信念——相信自己与人人平等的理念。寻觅过程是一个由量变引发质变的过程，最终的觉醒体现在边巴将护身符扔进江水中。在边巴刚来到部队时，战士小宋想要摘下他佩戴的附身符，他对此事抵触非常之大。但在军队渡江前，边巴在一阵沉默后，毅然将自己的附身符投掷到江水中去。小说中这样描写到：“他（边巴）认识到，藏族人民要想获得翻身解放，过美好幸福的生活，只有靠党的领导，靠亲人解放军的帮助，靠自己起来斗争。菩萨也好，佛爷也好，是帮不了什么忙的；念经也好，磕头也好，都没有什么用处。作为一个人民战士，更没有必要靠护身符来保护。”

“格桑梅朵”是由藏语音译而来的词汇。在藏语中，“格桑”意为幸福的美好时光，“梅朵”有花之意，因此格桑梅朵既可以看作藏族人口中的“格桑花”，又可以看作寄托着藏族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寄望，并含有西藏文化在藏传佛教背景下特有的“吉祥如意”的精神象征。《格桑梅朵》题目中所指的“格桑梅朵”，实质上指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甚至是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精神。

参考文献：

[1]降边嘉措.格桑梅朵[M].年海豚出版社,2011

[2]倪文豪.藏文化与藏文学[D].山东师范大学,2007

作者简介：

郑春玉(1986.12-),女,汉族,四川成都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汉语史研究。